

A YOUNG REFORMER

青年變革者

梁啟超 1873—1898

許知遠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自序

一個青年變革者

一

梁啟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豎領白衫漿得筆挺，繫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樣子，拍攝地可能是橫濱、墨爾本或是溫哥華。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組織起來，營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着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

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梁啟超與絡腮鬍鬚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以及一位裹頭、皺眉的男子並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我翻開書，得知裹頭男子名為馬丁·阿富汗尼，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們三人是 20 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

它引發了我的興趣。這是 2013 年深秋，我剛過三十七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找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閒暇裡，哥

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二樓 poetry room 的寂寥，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 (Jack Kerouac) 的黑白照片。這家書店不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發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它背後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 19 世紀中葉，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裡，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斜對面是「小意大利」，在這家令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 流連的小咖啡館裡，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着迷。

與梁啟超的偶遇，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二

當梁啟超 1873 年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清帝國正處於最後的平靜時期；當他 1929 年在北京去世時，帝國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國也陷入分裂與動盪，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組織正迅速崛起。社會變革席捲了每個角落：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探討「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閱讀報紙、雜誌成了日常習慣，人們在茶館裡、飯桌上談論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戲台上的名角將《定軍山》《長生殿》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因為火車、輪船、電報的普及，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儘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遵從三綱五常，如今卻宣佈拋棄整個傳統，要寫白話文，追求個人自由。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

取代，人們飢渴、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二十五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後推動者。

他是個思想者，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思想、小說理論……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迴避他的影響，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他更是個書寫者，自 1896 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三十三年時間裡，不間斷地寫下至少 1400 萬字，涉及時事批評、戰鬥檄文、組織章程、詩詞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幾代人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20 世紀的歷史性人物——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讀者，並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之中。我就讀的北京大學演變自京師大學堂，而他正是大學堂最初章程的起草人。我進入新聞業後，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沒有誰能像他一樣，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

但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像還佔據着公共討論的中心，「新民說」仍是日常語彙，流行偶像則把「少年強則中國強」寫入歌詞。但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與同代人的爭辯，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應進入塞繆爾·約翰遜 (Samuel Johnson)、伏爾泰、福澤諭吉與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的行列，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即使置於他自己的時代，梁啟超也該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這些人看到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在希望與掙扎中搖擺。梁啟超則從中國語境出發，回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對於科學、民族主義、個人精神都作出獨特判斷。但與用英文寫作的泰戈爾不同，他從未被中國之外的讀者廣泛認知。

這種情況與近代歷史的動盪和斷裂有關，也受困於中文歷史書寫的特徵。中國的歷史人物常受困於意識形態，很難得到連續與公正的評價。梁啟超自己也曾嘗試開啟現代傳記寫作，這一傳統從未真正紮根於中文世界，沒有一位中國人像鮑斯威爾 (James Boswell) 觀察約翰遜博士那樣描述一個人，更不會像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個人更像是歷史潮流的產物，而非自成一個世界。

這也與觀察角度有關。梁啟超常常僅被置於中國自身語境中敘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維度中，但他其實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在輪船、電報、鐵路、印刷術構造的現代網絡中遊刃有餘。他在橫濱編輯的雜誌被偷運到國內，給一代人展現了嶄新的知識與思想。他的足跡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與歐洲，所到之處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當地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鶩，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他在華盛頓會見了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在紐約拜訪了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邀請羅素 (Bertrand Russell)、杜威 (John Dewey) 訪問中國，在戰後的歐洲與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探討現代性的困境。

三

2015年9月，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我寫下第一行字。接下來的三年裡，這次寫作變成了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

這個旅程比想像的更為艱難。梁啟超的作品以及他參與的政治、社會轉型的廣度與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個人與時代之關係也難以把握。英國作家 Philip Guedalla 的警告始終在耳邊迴響：「傳記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域，北面的邊界是歷史，南面是小說，東方是訃告，西方則是冗長沉悶。」

對於在西方思想與文學滋養中成長的我來說，漢學與宋學之爭、公羊學的興起是一片充滿荊棘的森林，甚至僅僅文言閱讀就讓我頭痛不已。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終結時刻，是一個吃力而盲目地擁抱新潮流的開端。我受困於中國歷史書寫對個人情緒與性格的習慣性忽略，使得作為兒子、丈夫與朋友的梁啟超在個性的展現方面顯得過分單薄。

出於畏懼，最初的計劃被拆解成三部曲。這一卷有關他的早年歲月，從出生到戊戌變法的失敗，短短二十五年中，他從一個邊陲之地熟讀四書五經的少年，蛻變為將孔子改制與明治維新嫁接一處的年輕變革者。他的敏銳開放、自我創造與行動慾望，在這個時期展現無遺。他不顧功名等級的限制，拜入康有為門下；在上海的四馬路上，他駕馭現代印刷業發展的新浪潮，成為一種新文體的開創者。他迫不及待地將思想轉化成行動，是公車上書的策動者之一，並在學堂中鼓動年輕人的反叛意識，隨後捲入百日維新的派系鬥爭。

不管梁啟超多麼傑出，未來將怎樣聲譽卓著，此刻仍是歷史的配角，作為狂生康有為的主要助手出場。在彼時的中國學術與權力地圖上，他們都是邊緣人。但邊緣賦予他們特別的勇氣，令他們成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這也是歷史迷人之處，即使人人都受制於自身環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脫穎而出，成為異端與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 19 世紀末的政治與文化轉型，不了解一個帝國晚期讀書人怎樣應考，怎麼理解外部知識，聽甚麼戲，朋友間如何通信、宴請，審查之恐懼如何無處不在，你就很難理解這種反叛之價值。

地域特性就像時代氛圍一樣，給個人打上鮮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嚐了用陳皮製作的各種菜餚，一個夏日午後坐在殘留的廣州萬木草堂一角發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像報館與青樓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宮殿小吃攤上，猜測梁啟超剛抵達長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閒坐，想像他與譚嗣同、夏曾佑熱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輪輪的拆毀與重建中，歷史現場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賴想像力，儘管它常不可靠。

寫作不可避免地帶着當代意識。在觸發這本書產生的舊金山，梁啟超曾在一個世紀前到來。他四處演講，出席宴請，接見華人領袖，還品嚐了一種叫王老吉的飲料。他感受到這裡的人「愛鄉心甚重」，「義俠頗重」，更看到了不潔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與現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憲、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國，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單衣——「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①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種「新民」、一套新的價值觀，任何變革都是無效的。一個世紀過去了，華人後代

①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132、146 頁。

中有一位成了市長，另一位買下了曾鼓吹排華的《舊金山紀事報》，這座城市開始熱烈期待引入中國投資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會感到梁啟超的一些憂慮與困惑仍頑強地存在着，能激起迴響，已經獲得富強的中國也在尋找某種政治與社會秩序。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這本書是個避難所，每當我對現實感到無奈，就躲入了另一個時空尋求慰藉。在經常令人厭倦的寫作中，意外的驚喜也不時湧來。我感到自己日漸篤定，甚至生長出一種新的雄心。我越來越希望這三卷本的傳記成為一部悲喜劇、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我期望它能復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當梁啟超成為聲名鵲起的《時務報》主筆時，比他年長四十五歲的改革者王韜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籲的理念正展現在這個年輕人的報紙上；同樣閱讀這份報紙的還有安慶的少年讀者陳獨秀，二十年後，他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動的夏日裡，身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太平天國運動、甲午之戰的李鴻章，旁觀着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青年過分活躍的舉動，心中不屑卻又暗自欽佩。人性之弱點與光輝，個性之必然與命運之偶然，彼此交織。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歷史考驗面前也經常反目成仇，彼此疏離，然後在人生下一個路口再度交匯。

第一卷即將完成時，我讀到了博爾赫斯對吉本《古羅馬帝國的衰亡》的評論，在他眼中，閱讀這本書仿若「投身於並且幸運地迷失在一部人物眾多的長篇小說裡。其中的人物是人類的一代又一代，劇場就是世界，而其漫長久遠的時間則是以朝代、征服、發現

以及語言和偶像的嬗變來計量的」。^① 我很期待，這三卷本完成時，我的讀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這一卷中獲得，就請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① [阿根廷]博爾赫斯《愛德華·吉本〈歷史與自傳選編〉》，《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124頁。

目 錄

自序	一個青年變革者	I
引　　言	逃亡	001
第 一 章	茶坑村	011
第 二 章	學海堂	029
第 三 章	春闌	049
第 四 章	狂生	063
第 五 章	戰爭	085
第 六 章	上書	105
第 七 章	改革俱樂部	125
第 八 章	時務報館	159
第 九 章	主筆	189
第 十 章	海上名士	211
第 十 一 章	在長沙	243
第 十 二 章	保國會	275
第 十 三 章	定國是詔	299
第 十 四 章	咸與維新	331
第 十 五 章	政變	359
致謝		383

一個青年匆匆闖入日本駐清公使館。他額頭寬闊，鼻梁挺直，面色焦急，要找代理公使林權助。這一天是 1898 年 9 月 21 日午後，陰，炎熱異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來。^①

日本公使館是「一棟單層磚木結構的平房……正立面七開間，中砌磚作拱券式的大門」，帶有明顯的歐洲古典主義風格，門頂檐上的女兒牆上又砌了三角花。它的設計者片山東熊曾入讀東京帝國大學，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方訓練的建築師之一。^②

公使館的建築風格也是日本身份的另一種隱喻：渴望西方卻仍深植於東方。它所處的東交民巷正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縮影。東交民巷的歷史足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經由大運河運到此處交易，因此得名江米巷。到了明代，一些重要衙署、王府與寺廟開始在這裡興建。專供學習外國語言的四夷館也設立於此，「特設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又增設暹羅（泰國）」^③，這就是中華帝國眼中的異域世界，外來者總是朝貢者，臣服於帝國的繁盛與文明。由於「江米」與「交民」讀音相近，巷子逐漸被稱作「交民巷」，又變成了「東交民巷」，它不再僅指一個巷子，而是一片區域。清代的東交民巷更為喧鬧，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都在巷子西口，而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則在另一端。

巷子的意涵在 19 世紀後半葉再度發生改變。圓明園被一把大火燒毀之後，清帝國終於同意英國與法國在北京設立使館，這意味着中國人與外部的關係已徹底轉變。長久以來的「朝貢系統」被顛覆——這些

① 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69 頁。時為農曆八月初六。

②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中島雄其人與〈往復文信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第 27—28 頁。

③ 《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797 頁。

「野蠻人」與昔日「四夷」不同，他們更強大，還有自己獨特的文明。

英國與法國之後，俄國、美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奧匈帝國先後到來，建立使館。這條曾經用作稻米交易的狹長巷子，如今變成了一個西方建築、生活方式的展覽場，空氣裡經常飄蕩着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先生著名的銅管樂隊演奏的曲子。與上海、福州、寧波、廣州的租界不同，這裡沒有治外法權，仍被包容於北京的生活中，使節與夫人們也常抱怨北京道路的泥濘與腐臭。

日本公使館是東交民巷的後來者。儘管早在 1871 年中日就已建交，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日本使館要麼在寺廟要麼在租借的民房中暫時棲身——這也折射出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尚未將其看作一個平等的國家。直到 1886 年，日本終於在東交民巷有了一席之地。接下來的十二年中，公使館目睹了中日關係的戲劇性轉變。日本不僅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還成了清朝革新者們模仿的對象。日本公使曾為觀見皇帝焦灼不已，皇帝如今則充滿期待地等待着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來。

這位匆匆進入使館的青年，正是這樣一位革新者。「他臉色蒼白，悲壯非常。我判斷事體極為不尋常」，多年之後，時任使館參贊的林權助回憶。林權助認識這個年輕人，他是夏日北京活躍的維新者中的一員，名叫梁啟超，他的老師康有為更是有名，曾專門給皇帝上呈關於明治維新的著作。

林權助把梁啟超請入房間，開始筆談，漢語是彼時「東亞的拉丁語」，是通用的書面語。「僕三日內須赴市曹救死，願有兩事奉託，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林權助覺得這樣交流太緩慢，按鈴叫翻譯官進來。梁啟超隨即寫道「筆談為好，不必翻譯」，接着寫下「寡君以變法之故，思守舊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願易之，觸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譯官走了進來，對話加速起來。梁啟超乞求，日本出面

救助光緒帝與康有為，他自己準備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內會被殺」。

這個場景必定令林權助深感震撼，以至於將近四十年後仍能栩栩如生地回憶起來。其細節或有出入，情緒卻異常飽滿。這也與林權助的個人經歷相關，這位面頰修長的外交官三十八歲，是明治維新的產物。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死於倒幕之戰，且站在失敗的幕府一邊。他運氣甚佳，被戰勝一方收養，並有幸進入創建不久的東京帝國大學就讀，畢業後進入外務省，被派往中國煙台、朝鮮與英國倫敦，是同代人中最有經驗的外交官之一。比起回國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視野與決斷更勝一籌。他體驗過北京維新的熱浪，還為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提過諸多建議。在這些中國維新者身上，他不難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權助允諾梁啟超，努力去辦他交代的兩件事，並勸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想一想，必要時隨時到我這裡來。我會救你。」

梁啟超離去後，林權助向正住在公使館的伊藤博文匯報，這位明治維新的重要締造人剛卸任首相，正在進行中國遊歷計劃，此刻恰在使館。「我完全明白了。梁這個年輕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館門口一陣嘈雜，接着梁啟超闖了進來。伊藤要林權助救助梁啟超，「讓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後我來幫助他」，「梁這個年輕人對於支那而言是一個奢侈的靈魂」。^①

留在公使館的梁啟超，當夜必定難眠。這是充滿慌亂與恐懼的一

① 以上過程的記載見《林權助回憶錄》，岩井尊人筆記、陳鵬仁譯，台北：致良出版社，2015年，第38—40頁。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三）也收錄了林權助的文章《救快男兒梁啟超》（第570—575頁），不過是節錄，且譯文風格有所不同。

日。早晨，太后宣佈訓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就很有限的權力。她頒佈的首道政令就是捉拿康有為兄弟：「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為的支持者御史宋伯魯也「即行革職」。^①

康有為因稍早離開北京，躲過了一劫，康廣仁則在南海會館被捕。一時間流言四起，據說康有為的另一位支持者、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的家也被抄了。在京城的茶館中，人們紛傳皇帝設謀加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簾。^②

已預感到大禍將至的梁啟超，當日早晨正在瀏陽會館與譚嗣同「對坐榻上，有所擘畫」，這時「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③他們連忙拜訪李提摩太，想做最後的努力。多年來，這個操着山東口音的英國傳教士以促進中國變革為己任。三人隨即商定尋求國際力量，容閔去拜訪美國公使，李提摩太去找英國公使，梁啟超則前往日本使館。但美國公使進了西山避暑，英國公使正在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啟超找到了林權助。

除去給他提供個人庇護，日方拿不出更具體的方案。梁啟超或許也被某種羞愧左右，他無法解救陷入危險的皇帝與老師，還躲避起來。翌日，這種羞愧更為加劇。

譚嗣同八月初七（9月22日）進入公使館，隨身攜帶了著作與詩文、家書的稿本數冊，請求梁啟超保存。他勸梁東渡日本，自己則選擇留下，並以程嬰與杵臼、月照與西鄉這兩個例子來慰藉梁與自己，

① 茅海建《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補證、修正》，見《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21—122頁。

②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051頁。

③ 王夏剛《譚嗣同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48頁。

分別通過一死一生來踐行理念。在另一則更為生動的回憶裡，譚嗣同還說，海外有很多廣東華僑，梁啟超可以鼓動他們，建立新的變革基礎，而自己作為一個言語不通的湖南人，發揮不了作用。說完這些，他們「遂相與一抱而別」。^①

對於林權助而言，這也是個充滿考驗的時刻。收容梁啟超的決定，並未得到日本外務省的許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態度。八月初七，他發電給外交部，談及政變的發生、被通緝的康有為、張蔭桓府邸被圍等事。他意識到持續了整個夏天的變法終結了，「皇帝陛下最近數月間已成改革運動之中心，經如此之變故，其權勢應有所削減」。他沒提梁啟超正在使館內躲避。^②

時間意味着新的危險，對梁啟超的通緝尚未到來，卻隨時可能發生。當天，林權助請鄭永昌（日本駐天津領事，據說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護送梁啟超離開北京，計劃先乘火車抵達天津，再搭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離開公使館前，梁啟超做出人生另一個重大決定，他剪掉腦後的辮子，並換上了西裝。或許維新者私下談論了很多次斷髮易服之必要，但真的發生時，內心恐怕也不無掙扎，它畢竟意味着公開成為反叛者。

梁啟超隨鄭永昌走出使館時，看上去就像個日本人，中國僕人緊隨其後。當天下午三點，火車開赴天津。在紫竹林車站，等候在此的日本領事館翻譯井原真澄發現，同行者中還有「一個穿西裝、用手帕遮着鼻子的男士和中國的僕人」。他問鄭永昌此人是誰，卻沒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後。回到領事館後，他才知道，原來這就是

① 王夏剛《譚嗣同與晚清社會》，第 249 頁。譚嗣同是否真的進入了日本公使館，仍存疑。

②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 482—483 頁。

大名鼎鼎的梁啟超。^①

他們將梁啟超藏在領事館二樓，一切需求由僕人代辦。井原真澄隨即發現，不斷來訪的天津變革者說，梁啟超已經下落不明，還請他設法相助。李鴻章建立的洋務事業在天津催生出一個維新群體，其中很多人來自廣東，「都很熱衷於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對伊藤的到訪抱有很大的期待。^② 政變消息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他們慶幸康有為躲過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啟超正在樓上。

在八月初八的電報中，林權助向東京彙報整個事件：「主張改革的梁啟超因怕可能隨時被捕而來到本館，需求保護。他住了一晚上。由於害怕清國會產生懷疑，我勸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達前離開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許他在本館住一晚上也不至於給清國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還沒有被捕的話，幾天後，他將乘玄海丸從天津赴日本。」他強調伊藤正住在使館，「當前的這種政治局勢迫使我要求這麼做」。他期望得到 2000 元電匯電信費，還有 1000 元的津貼費，作為機動費用。

他同時致電鄭永昌與駐上海領事諸井六郎，要求「高雄艦、大島艦的艦長由此奉命與你們一起觀察近日的事態發展」，高雄艦正在上海，大島艦則在天津大沽港。^③

大隈重信支持了林權助的決定，還在同一天發電報給聖彼得堡與倫敦的日本使館，通報了北京的政治新動向，令他們探聽這些國家的態度。

梁啟超躲藏在天津領事館時，氣氛已經變得越發緊張。八月初

① 陳鵬仁《梁啟超逃出中國之經緯》引井原真澄的回憶，載《林權助回憶錄》，第 206 頁。

② 同上，第 205 頁。

③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 484 頁。

九，新的上諭到來：「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弟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①

對梁啟超的通緝令也隨即到來，在北京捉拿未遂後，朝廷又電旨兩江總督劉坤一在上海緝拿。八月初十，上海道台蔡鈞搜捕了已改為官書局的大同譯書局。所幸，住在其中的梁寶瑛、梁啟勳及李蕙仙聽聞北京消息後，已於八月七日返回廣東。

天津領事館意識到，讓梁啟超等到四天後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險了。八月九日晚九點，鄭永昌與另兩個日本人陪梁啟超由紫竹林搭船前往大沽，他們化妝成打獵的樣子，計劃遇到清兵盤問就說自己要去打鳥。在河上航行一段後，他們被一艘蒸汽快船追蹤，上面乘坐着持槍的清兵。十號凌晨兩點左右，他們終於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馬號士兵聲稱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為，懷疑康就在這艘船上。

鄭永昌隨即抗議，說船上並無此人，拒絕搜查。士兵毫不理會，他們將繩索纏上這艘小船，準備將其強行拖回天津。逆行了兩百多米後，鄭永昌斥責這些士兵非法，又一輪爭辯後，快馬號同意回天津向總督府彙報，同時派一隊士兵登上小船，以護送之名前往塘沽。大約七點，小船抵達塘沽港，恰好與日本大島號軍艦相遇。鄭隨即揮帽，軍艦也放下快艇迎接他們。清兵感到不妙，乘坐路過的一艘清國船隻離去，不願再談。鄭永昌登上軍艦後，留下梁啟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車站。^②

經過這驚魂未定的一夜，梁啟超甚至來不及喘口氣，新危險就再度湧來。第二天八點，又一隊清兵登上大島號，聲稱要追捕康有為。派遣者正是袁世凱，因榮祿奉旨入京，他暫時護理直隸總督。「該華人年約在三十以內，似非康犯，或為康黨」，袁世凱在八月十一日給

①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 1061 頁。

②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 491 頁。

總理衙門的電報中寫道。一天後，他又在電報中更詳細地描述情形，稱派往查看的洋員魏貝爾在查詢時，大島艦主「堅不肯認，佯不知康犯」，而經過一番訪查後，魏貝爾發現船上「實有華人一名，年紀甚輕，已剃髮改裝。究係何人，無由確查」。^①

很快，9月26日，大島艦上又來了一位逃亡者。王照是梁啟超的朋友，也是一名活躍的維新者，但與康有為、梁啟超不無分歧。他兩日前被以「莠言亂政，奸黨竊權」的名義彈劾，同樣被日本人所救。這是涕淚交集的相遇，在這天崩地裂式的悲劇面前，之前的分歧變得毫不重要。他們對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們是生是死，同樣不知光緒皇帝會面臨怎樣的命運，革新的中國又會如何。

他們決定給伊藤博文與林權助寫「泣血百拜」的書信，目之所及，似乎唯有這兩位外來者才可能提供某種幫助。「啟超等憂患餘生，所志不成，承君侯與諸公不棄，挈而出之於虎狼之口，其為感激，豈有涯耶」，他們先是表達了感激之心，接着開始擔憂光緒的境況，相信外界謠傳的光緒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構陷，皇帝可能被謀害了，因為他在幾個月的變法中一直表現得生氣勃勃。他們請求日本聯合英美諸國，或者致信慈禧太后和總理衙門，要「揭破其欲弑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們甚至說，諸國干涉或許會導致亡國，但比起俄國庇護下的滿洲政權導致的「亡國」，寧可要日本、英、美維持下的亡國。他們還懇求伊藤，代為救助身陷獄中的譚嗣同、徐致靖、康廣仁等人，因為中國「風氣初開，人才甚少」，他們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許就有西鄉隆盛式的豪傑，若被「一網打盡，敝邦元氣無付之士」。落款處是「啟超，照，又拜」。^②

①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493頁。

② [日]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17—218頁。

對於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

《三十自述》寫於 1902 年。按照中國人出生即為一歲的習俗，梁啟超恰好三十歲，倘若孔夫子的教誨沒錯，他該進入一個言行恰當、懂得禮數的人生階段。梁啟超的自述與慣常的中國文人不同，他用一種令人難忘的視野，把自己的命運編織進一個更廣闊的時代畫卷，既與中國內部的興衰有關，也與世界性的歷史事件產生聯繫，儘管他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意大利建國於 1870 年，而不是 1873 年。

當梁啟超在 1873 年 2 月 23 日出生時，這樣想像時間與空間在中國幾乎沒有可能。他的出生被嚴格限制於中國的農曆紀年方式，癸酉年正月二十六日，這種紀年六十年一循環，暗示着不管是個人軌跡還是歷史變遷，都是無往不復的。時間也遵循着政治權力的節奏，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國正逐漸從巨大的內亂中恢復過來，與西方外來者達成了暫時平衡，史官已經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興」來形容這個時刻。梁啟超就誕生於這個短暫的、相對平靜的中興時代。

同樣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點。茶坑村是熊子鄉的五個村莊之一，整個鄉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島。它所在的新會縣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歷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國時期。與嶺南大部分地區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新會不過是野蠻南方的一個區域，充斥着瘴氣、怪獸與野人，離中原文明遙遠之至。它的轄區與名字隨着朝代更迭變化，在隋代與唐代，還曾短暫得名岡州，是中央政權從中原不斷向南擴展的明證。不過，真正塑造了此地的兩個歷史事件都與宋王朝的崩潰有關。1273 年，相傳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與商人私奔，藏身於廣東北部

南雄的珠璣巷。^① 朝廷要派兵緝拿的傳聞造成大量居民南遷，新會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頭追溯於此，包括茶坑的梁氏。這座小村莊橫跨梅嶺關口，是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貿易往來的必經之地。廣東的珠璣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樹一樣，被很多人視作家族的起源。^② 這半神話半真實的族譜也象徵中國歷史的最堅韌之處，憑藉流動的家族力量，得以對抗外族入侵、政治動盪、自然災害。另一個決定性事件發生於五年後，南宋末代皇帝趙昺率二十萬軍民駐紮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敗後，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③ 這兩個事件都是蒙古人征服中原引發的逃亡，這段不無誇張的虛構歷史給予本地人一種特別的身份感——儘管身處帝國的邊緣，卻以中國正統自詡。

湧入的人口也改變了這裡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歷史學家的大膽猜想，蒙古軍隊的入侵導致北部山區被拋荒，加速了土地被侵蝕，將更多的泥沙通過北江送入珠三角區域。這一進程與羅馬帝國衰落時的景象頗有些類似，地中海山區的土地被拋棄、腐蝕後，山嶺退化，泥土也逐漸沉澱到低地區域。^④ 移民不斷填海造田，種植稻米、桑樹，原來的沼澤、濕地、森林變成沙田。擴展的田地與不斷繁衍的人口相互促進，催生出一個越來越繁榮的珠三角區域。這個進程在 16 世紀中葉陡然增強了，因為廣州、長崎、馬尼拉貿易圈的形成，加上歐洲人對茶葉和蠶絲的大量需求，白銀源源不斷地湧入，這個地區也迅速商業化。

① 《新會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 頁。

② 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移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徵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歷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③ 《新會縣志》，第 4 頁。

④ [美]馬立博《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王玉茹、關永強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79 頁。

新會縣正建於這塊仍在不斷擴展的沖積平原上。它離廣州 110 公里，西江縱貫新會全境，潭江橫穿其西部，它們在入海口處匯成銀洲湖，南海就此展現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築造小堤基，最初種植稻穀，隨着商業化浪潮的興起，茶葉、蠶桑、紅煙、蔬菜、蒲葵與甜橙成為主要的種植物——後兩種尤為著名，它們是明清兩代的貢品，還遠銷周邊的省份。到了清代，新會已經是廣東最繁華的市鎮之一，儘管跟臨近的佛山、順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 1873 年經過新會，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過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連接着市鎮與鄉村，比起遼闊的平原與水域，這些城鎮與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裡的豌豆」。一位名叫托馬斯（R. D. Thomas）的旅行者 1903 年途經西江流域，看到成片的稻田，果樹、魚塘、桑樹一眼看不到頭。在繁榮的市鎮裡，他看到祖祠前豎着旗桿，石墩上刻着獲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員的名字，村中還有為風水而建的石碑與寶塔。^①

茶坑村就是這圖景中的一個普通村落。如今一條大道聯通着村口與縣城，撈沙填海早已讓城郊連成一片，但在 19 世紀後半葉，西江、潭江與銀洲湖匯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點綴其中，茶坑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孤島，而梁啟超，就像他自己宣稱的，是中國南部邊陲的一個島民。

二

茶坑村的歷史可以上溯到 15 世紀初，也就是明代初期雄心勃勃的永樂皇帝的年代，除了篡奪侄兒的皇位，他以派遣鄭和出海聞名。

①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

梁姓與袁姓依山而居，在溪水旁種茶樹，茶坑村便因此得名。這個孤島因島上的熊子山著名，山頂矗立着七層高的凌雲塔，修建於 1609 年，離這個王朝的崩潰為時不遠。圍繞着凌雲塔有兩個傳說，一個說它是為了壓制山下有毒的三腳魚，另一個則是因為此地文風不盛，而它將帶來好運氣。塔尖設計如葫蘆，中空，有大小孔眼排列，一有風吹過，就會發出動人的聲響。

梁啟超出生時，這個家族已在此居住了超過十五代。梁家聲稱來自南雄的珠璣里，再向前則追溯到福州。可考的紹祖是北宋進士，曾任廣東提幹，以孝著稱，母親去世後，他在墓旁造蘆草屋守孝，還在周圍種植松柏，修建亭子，據說蘇東坡為此賦詩給他，並書其亭為「甘露亭」。^① 但接下來，梁家似乎再未產生與之媲美的人物。

梁啟超這一支是明代天啟年間（1621—1627）定居茶坑村的。村中梁氏分為大井里、羈馬里、南興里、嘉亨里四個不同的宗族，梁啟超屬於嘉亨里。對這個家庭來說，更清晰可考的祖先是梁毅軒，他出生於乾隆二十年，直到二十七歲才生下唯一的兒子梁寅齋，從推崇多子多福的傳統看來，這無疑是個打擊。不過寅齋給家族增添了新的希望，一連生下八個兒子，其中老二梁維清是梁啟超的祖父。

生於 1815 年的梁維清給家族帶來了起色。這個勤奮的讀書人分家時僅分得幾分田地、一間磚房，卻充滿了上進心。他苦練唐代柳公權的書法，最終也考取了秀才，儘管只是科舉功名中最低的一等，卻已經足以變成士紳階層的一員，躋身村裡的領導人物行列。

在梁啟超的描述中，梁維清再好不過地體現了一個儒生的作為。他同時肩負知識與道德權力，在村中參與公共事務，將土路修成石路，興修水利，發展教育；他粗通醫術，替鄉人看病時從不計較診

^① 新會梁氏族譜研究會編《新會梁氏族譜》，2003 年，第 25 頁。

金。在特別的危急時刻，他還捲入平定叛亂、保衛家園的活動中。1854年，陳開、李文茂的紅巾軍圍攻廣州，新會的陳松年、呂萃晉起兵響應，圍攻會城。各縣成立「保良局」來應對叛亂，各鄉推選有功名或年長者擔任「保良會」會長。茶坑村也陷入騷動不安，「無賴者輒思逞」，梁維清在熊子山下的四個自然村設立保良會，「以故一鄉無亂民」。^①數百年來，整個帝國秩序正是依賴一個個這樣的本地士紳艱難維持。

梁啟超也願意強調祖父的美德，用千篇一律的文辭來形容他：勤儉樸實，行為縝密，忠厚仁慈，待人周到，治家嚴格。有樁事跡的確可以多少證明這一點：父親去世後，梁維清作為一家之主，把財產平分給兄弟，其中一些只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梁維清娶了一位官宦之後。妻子黎氏的父親曾高中乾隆四十六年的探花，死在廣西提督的任上，她嫁到茶坑村，多少像是家道迅速衰落的結果。黎氏為梁家生下三個兒子，梁寶瑛最年幼（或許也最聰穎），梁維清寵愛他，竭力傳授他讀書。比起父親，梁寶瑛的科舉之路更不平坦，甚至連秀才都沒考取。不過，生活還不算糟糕，梁維清將二十多畝土地平分給三個兒子，梁寶瑛分到六七畝，自耕自種。他沒放棄書本，成為鄉間教書先生，自稱「舌耕為業」。當時流行一句諺語，「家有三石糧，不作童子王」，說明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失意文人的選擇。^②

梁寶瑛娶了一位聰明賢惠的妻子。趙氏出身書香人家，祖父曾高中舉人。她以賢良孝順著稱，不僅善於女紅，而且識字——當時讀書是男孩的特權——讓她顯得很不尋常。她的品德讓很多人折服，族中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頁。

② [英]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人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3頁。

女孩願意跟隨她學習女紅，據說村中兒女婚配時，只要女方曾跟隨她學過女紅，就會贏得「德性必佳」的信任。^①不難理解，她也是梁維清最鍾愛的兒媳。

梁啟超的出生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滿足與希望，他是這個小家庭的第一個男孩，也是長孫，是家族未來的繼承人，注定肩負起與宗族其他支脈競爭的任務。

如同所有孩子一樣，母親在他生活中扮演了第一個重要的角色。趙氏性格活潑、靈巧而富有藝術感，梁啟超日後的情感充沛或許與此不無關係。她也是他最初的啟蒙者，教他牙牙學語、讀書識字。日後，梁啟超批評中國女學不興，致使兒童不過在灶膛、閨房這些地方廝混成長，無法自幼學習文化與知識，而他的母親肯定不屬於這個行列。趙氏有一種樸素而強烈的道德意識，梁啟超記得自己童年時，不知因何事說謊，終日含笑的母親突然盛怒，鞭打他數十下，警告他再說謊會變成盜賊與乞丐。這不無詛咒的訓誡影響了梁啟超一生，以至於他多年後還記憶清晰，始終保持誠實，對他人與自我有一種難得的坦誠。

父親則是嚴厲得多的角色。「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於禮，恆性嗜好，無大小一切屏絕；取予之間，一介必謹；自奉至素約，終身未嘗改其度」，梁啟超日後說父親尤通「淑身與濟物」之道——「淑身之道，在嚴其格以自繩；濟物之道，在隨所遇以為施」。^②在僅存的一張合照上，梁寶瑛臉頰消瘦，額頭寬闊，顴骨頗高，有一種隨年齡而來的鎮定。可以想像，他應該是個過分拘謹的讀書人，將科舉的失敗轉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這道德要求又經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現實誘惑吞沒——這也是整個帝國的特徵，在一套高潔、誇張的言辭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頁。

② 同上，第7頁。

背後，是一個道德坍塌的社會。日後，他東渡日本，向流亡中的梁啟超索要錢款購置產業，甚至以死相威脅，直到梁的學生集資 1200 銀圓，讓他得以回去繼續購買田產。多年後，梁啟超還在勸父親不要着迷於田產，聲稱自己寧可買雞吃，也不買田產。

在儒家倫理支配的家庭秩序中，父子關係常陷入緊張與拘謹。梁寶瑛經常因外出教書，不能陪伴在兒子身邊，還要刻意保持父親的威嚴。親密感反而發生於祖父與孫子之間。梁維清是梁啟超最有力的童年塑造者，這個不算得志的秀才把諸多期望都寄託在長孫身上，從三個兒子中選擇到幼子家居住，好與長孫朝夕相伴，把自己的學問、感受傳授下去。他最初教授的啟蒙課本大概是俗稱的「三百千」。從宋代開始流行的《三字經》是大約五百個漢字構成的初級識字課本，三字一行，便於記憶，涉及的內容包括讀書、倫理、數目、家畜、五穀諸方面，最初的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是中國人對人性最基礎的看法。《百家姓》用 472 個漢字列舉出中國最常見的姓氏，其中梁姓排在第 128 位。《千字文》通常是很多人的第一本教科書，裡面包含一千個各不相同的漢字，四字一韻，包括自然現象、歷代名人、帝王朝廷、為人處世、農耕、飲食、園林、祭祀等方方面面。這三本書大約兩千個漢字，構成了一個兒童最初的文化世界。

充滿期待的祖父不滿足於只給梁啟超看這些啟蒙讀物。梁啟超不過四五歲，就已經開始聽祖父講解《詩經》與「四書」了。教育不僅存於書本上，也體現在日常生活裡。祖父會帶孫子們去看廟宇裡的古畫，給他們講解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的故事，並指點着牆壁上的畫作，說這是朱壽昌棄官尋母，這又是岳飛出師北征——它們都傳達着中國讀書人最愛的忠義道理。在北帝廟中，祖父還寫過一幅長聯：週歲三百六旬，屈指計期，試問煙景陽春，一年有幾？展開四十八

幅，舉頭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無多。^①

梁維清尤其喜歡講述南宋、晚明之事。每年清明，全家從村子裡乘舟來崖山掃墓——他們的高祖葬於此地——沿西江而下時，會路過一塊高約數丈的巨石，突出在江面上，上刻「鎮國大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② 1279年春，南宋與元做最後的決戰，二十萬軍隊捲入其中，戰鬥持續了二十三天，它的結束與高潮同時到來，陸秀夫背着九歲的趙昺從江中一塊巨石上縱身一躍。這充滿象徵的一躍，不僅是一個朝代的謝幕，在後世很多人看來也是某種文明形態的結束。據說文天祥被囚禁在蒙古戰船上，目睹了這場天崩式的失敗。漢人將領張弘範轉投蒙古政權，成為這一悲劇的催生者之一。

晚明與南宋分享着相似的悲愴。船過巨石時，梁維清喜歡吟誦陳元孝的詩句：「海水有門分上下，關山無界限華夷。」^③ 這位明末清初的詩人以遺民自居，認定滿人就像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樣，都意味着華夏文明被野蠻力量吞噬。每當吟誦時，祖父還會提高聲調，聲音中充滿悲壯。清王朝的統治已近兩百年，這樣公開地感慨華夷之分不無反叛的意味。

梁啟超日後也喜歡把崖山視作故鄉新會最光榮的一刻，「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④ 很有可能，流亡中的梁啟超因排滿需要誇大了這種回憶，不過這的確是嶺南特有的傳統，這裡的文人執着於宋明理學，對忠誠、氣節尤其迷戀，始終與某種反叛性相連。

① 佳木《梁啟超故鄉述聞》，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49頁

②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頁。

③ 同上，第5頁。

④ 崔志海編《梁啟超自述》，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頁。

三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家庭正遵循着「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的生活方式。這是一個不斷擴充的家庭，趙氏生了四子二女。兩個女兒沒留下名字，像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充分證明。梁啟超幼年常與比他年長三歲的姐姐嬉戲，年幼四歲的梁啟勳則一直追隨他。因為缺乏醫療技術、普遍的營養不足，死亡從來是傳統社會的一部分，梁啟超出生兩個月後祖母就離世了，三弟也在五歲時夭折。不過家庭仍然充滿和睦，祖父溺愛長孫，有次吃飯蒸了一隻雞蛋給啟超，啟超分了一半給啟勳，啟勳又分給其他弟弟。這些親密感至關重要，讓梁啟超一生都非常看重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梁啟超日後說，茶坑生活「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自己是個「不帶雜質之鄉人」，「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①這既有賴於帝國晚期的暫時平靜，也與嶺南地區特有的結構有關。宗族早在宋代已經成型，直到明代才在珠三角地區發展出一套錯綜複雜的系統，與皇權妥協又保持着相當的獨立。晚清帝國控制力進一步衰減，宗族影響力則相應增加，新會城內遍佈的宗族、祠堂都象徵了這一點，人人都知道，五罝沖的劉氏、南邊壙的許氏、南門頭的莫氏沒人敢惹。何氏家族更是聲名顯赫，祖上有人出任過明代南京的六部尚書，僅尚書坊的何氏祠堂就有二十餘間。

在茶坑，梁氏是絕對的大姓，五千居民中約佔三千，自為一保，剩下的余、袁、聶等姓分為二保。這樣的村莊遵循着自治原則，村裡的最高權威是「三保廟」，氏族糾紛都必須通過它的裁定。族內居民的所有問題，都由各族的宗祠來解決。對於梁姓人家來說，從禮儀性

^①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第7冊，專集之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85頁。

的祖宗祭祀，到偷盜、賭博、通姦的家庭糾紛，娛樂性的正月放燈、七月打醮、請外來戲班演出，再到設立蒙館三四所，聘請教師教育本族兒童，都是由宗祠「疊繩堂」來掌管的。疊繩堂既負責經濟管理，也代表道德權威，負責懲罰族內的不法行為，比如偷盜、通姦、不孝等。懲罰方式頗有想像力，犯錯者會被「停胙」、「革胙」，禁止拜祭祖宗，在一個祖先崇拜的社會中，這是極大的處罰，不啻剝奪了人生之身份。對姦淫的懲罰更富想像力，疊繩堂殺掉全村的豬分配給全鄉人，犯罪家庭則要按豬價賠償，稱為「倒豬罪」。

「疊繩堂」的管理結合了道德權威與內部民主，由五十一歲以上的老人組成的耆老會議頗像古羅馬的元老院，有功名的年輕人（秀才、監生）亦可參加，總數有六七十人，但開會不必全到。未滿五十者可以旁聽，也可以插話。四至六名壯年子弟擔任值理，執行耆老會議的決議，其中兩人專管會計。保長一人，專門應對官員。會議每年兩次，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舉行，有時也會有臨時召開，負責調解紛爭。族人都普遍承認它的權威，很少訴訟至官府，他們普遍覺得這樣做不道德。禮儀與教育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族中貧戶即使無力納糧，學堂也不得拒絕其子孫入學。這種系統正符合一個農業帝國的統治方式，個人忠於自己的宗族與家鄉，而不是抽象的國家，藉由教育與道德語言，帝國也將教化滲透到每個臣民內心。

梁啟超是被稻田、茶園、溪流、祠堂、迷信包圍的，他被保護、同時也被控制。茶坑村的景象令人想起一位英國人對中國的感歎：「儘管發生了無數次的叛亂和入侵，但經歷滄桑之後，她那燦爛的文明和受到祖先崇拜及宗族教育的固有傳統仍然被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中國確實有一些令我們本能地心懷敬重的東西，有時甚至是帶有嫉妒的羨慕……正是中國人對實踐和實用有限考慮的從容不迫的態度，以及中國

人長於沉思的哲學和甚至身處貧困之境也能歡欣快樂的品格。」^①

「吾鄉鄉自治最美滿時代，」梁啟超日後寫道，「此種鄉自治，除納錢糧外，幾與地方官全無交涉。」^②他可能將過去浪漫化了，其實這裡民間械鬥的風氣甚濃，1882年，陳姓與林姓就因爭奪沙塘圩賭規械鬥，直到知縣派兵鎮壓，責令陳姓賠償林姓五十二條人命（折合白銀10 400兩）。^③西邊的天馬鄉、東南的三江鄉均族大人多。茶坑村仍會仍受到鄰村的欺侮，有一年茶坑人在三堡廟做戲，鄰近的天馬鄉人撐舊船來看戲，回去時把茶坑人的新船撐走，事情最後落得不了了之。在茶坑村內部，梁氏是權力中心，譚姓、陳姓不得與梁姓通婚，只能為梁家挖沙，抬棺材——以船為家的疍民很久後才被接納。

四

六歲，梁啟超正式上學。祖父在附近一間小屋開設了「怡堂書室」，梁啟超與家族裡年齡相仿的學童是第一批學生，表伯父張乙星充當第一任老師。按當地風俗，入學這一天，梁啟超要穿上新衣，母親則把一棵青葱捲上紅紙，以示孩子越來越聰明。廳堂前有一個小天井，孔子像掛在堂上，新學生給孔子牌位叩頭，給老師行跪拜禮，正式進入一個禮儀化的世界。

這也是人生的一個關鍵時刻，他們從此擁有了擺脫鄉村生活、光耀門楣的可能。自唐代創建科舉制度以來，除去反叛，讀書是獲得權力、財富、榮耀的主要途徑，也是個人擺脫壓抑的底層生活的重要手

① [英]約翰·濮蘭德《李鴻章傳》，張啟耀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頁。

② 梁啟超《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飲冰室合集》第10冊，專集之八十六，第60頁。

③ 《新會縣志》，第30頁。

段。科舉制形成了對書本、讀書人的一種天然崇拜，在廣袤的帝國，每個兒童都會熟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訓導，一個鄉間老太都知道「敬惜字紙」的含義，文字蘊含着權力與財富，帶字的紙張不能被踩在腳下、焚燒。這種讀書熱忱常令外來者吃驚不已，17世紀初，一位傳教士在廣東發現「學校多如牛毛。不僅二十或四十戶人家的小村子有學校，而且每個鎮的街上都有好幾所學校。我們在經過的街上幾乎一直都能聽到孩童背誦課文的聲音」。^①

但這位傳教士並不知道這些課程是多麼單調、乏味，又是多麼扼殺想像力。背誦是這種教育的首要特徵，而且要用一種搖頭晃腦、大聲朗讀的方式，似乎唯有這樣的戲劇化動作才能將知識塞入腦中。日後歷史學家估測，從兩三歲起到八歲，一個學童要認識兩千個字，接下來則要背誦四書、五經等經典。接着，最重要的訓練登場，他們要學作「制藝」，也就是所謂八股文，科舉考試的唯一文體。^②

「怡堂書室」是遍佈中華帝國的各式學校中最不起眼的一種，像所有學堂一樣，它也是維繫帝國統一的重要組成，灌輸給帝國子民相似的觀念，激起他們共同的希望，還規訓他們的言行。

在學堂裡，梁啟超的聰慧立刻突顯出來，他記憶力驚人，對語言極度敏感，尤其善於作對子。在科舉應試中，作帖詩一項關鍵在於對仗，比如天對地，雨對風。六七歲時，他就以「南國人懷召伯棠」對私塾先生的「東籬客採陶潛菊」；他為前來拜訪祖父的客人奉茶時，客人問他「飲茶龍上水」，他則不無俏皮對以「寫字狗扒田」，這兩句都是新會的俗語。^③這種能力讓梁啟超的家人對他充滿期待。

① [美]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劉永華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9頁。

② 參見鄭曠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88—94頁。

③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頁。

張乙星之後，梁寶瑛成為學堂先生。屢次挫敗後，他正式放棄了應試，安心做個教書匠。這種安心飽含着新的憧憬，他要讓長子走上功名之路。跟他讀書的梁啟勳日後說，父親的課堂不過是讓幾個族內孩子陪着梁啟超讀書而已，誰都知道梁啟超前程遠大。

八歲時，梁啟超開始正式學習「制藝」，這是學童的一個重要時刻，意味着科舉之路的開啟。短短七百字的文章，要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後面四個部分各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一共八股，因此俗稱「八股文」。他們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氣說話，要讓四副對子平仄對仗，不能違背朱熹注解的經義，自我表達更是被嚴格禁止。在嚴苛的形式感下，書寫者發揮空間極小。你可以想像它對孩子天賦的抹殺，教授者自身就充滿不足，即使父親是他的教師，梁啟超也終身對鄉村學究充滿憎恨，甚至用「蠢陋野悍」來形容這些人，批判他們的教學方法：「未嘗識字，而即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強之為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①

梁啟超當時還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看不到另一種可能，況且一個兒童眼中的事物總是充滿新奇，生活中滿是各種嬉笑、玩耍。他可以和夥伴們下水捉魚，登上凌雲塔吹風，在廟宇、祠堂裡做遊戲。他沒有留下童年照片，當時照相術已經傳入中國，只有很少的人接觸過，大部分人相信，它能勾走魂魄。根據梁啟超日後的照片推測，他這時候已經是那種廣東人常見的樣子，寬額頭、闊鼻子、臉頰圓潤。他剃掉前額的頭髮，後面紮起辮子，這是滿人統治者的征服記憶與漢人臣服的標誌。

① 梁啟超《論幼學》，《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頁。並見《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一，第45頁。

整個家族似乎都把希望寄託在了這個男孩身上，以至於當他玩耍興奮過度時，父親都會提醒他：「汝自視乃如常兒乎？」^①因為這種期待，祖父與父親認定他值得有個更恰當的老師。十歲時，他前往新會縣城跟隨周惺吾在專門的經館中學習。

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師。會城是一個更豐富的世界，繁鬧的市場、城隍廟、縣衙、學宮，還有一處為陳白沙修建的紀念堂。陳白沙是新會歷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對儒學的創新性洞察而聞名。

一些新事物也已經湧入這座老城。1871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牧師那夏禮（Dr. Henry V. Noyes）來到會城，設立關東街福音教堂；1874年，香山、新會自行捐造火輪船作為緝捕船；一些新會人則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美國的鐵路、巴拿馬運河、馬來西亞的橡膠園、澳大利亞的煤礦、秘魯的金礦，都需要勞動力，這些移民在海外建立了各式的岡州會館、四邑會館，為中國與世界建立了聯繫，也成為梁啟超日後變革中國的基礎。^②還有一些少年則獲得另一種人生選擇，1872年，清政府選派了第一批三十位留美幼童出國，其中有新會縣人陳巨溶（十三歲）、陳榮貴（十四歲），領隊人是來自臨近香山縣的容閎，他是第一位中國赴美留學生，畢業於耶魯大學。

梁啟超對於這些外界變化渾然不覺，還沉浸在一個目的明確的世界裡。九歲時，他已能下筆千言。十歲時，他贏得了神童的名聲。多虧了周惺吾這個善教的先生，梁啟超很快就邁出漫長科舉生涯的第一步，參加了童子試。

童試由三場連續的考試組成，新會城的縣試，廣州府的府試，最後是學政主持的院試，考生三場全部通過才能獲得生員功名。縣試在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頁。

② [美]譚雅倫《落葉歸根（摘譯）——新會1893年義塚札記》，舒奮譯，《五邑大學學報》，2001年第3卷第2期。

北門學宮旁的考棚舉行。考生要完成一系列繁瑣的手續，先去衙門的禮房報名，填上祖輩三代姓名出身，還有與擔保人出具的保結——擔保應試人無人冒籍、頂替、喪匿，身世清白。考試也對娼妓、優伶、皂隸子弟有所排斥，他們不能參加科舉。^① 這些都意味着梁啟超進入了一種嶄新的人生節奏，他的生活將圍繞一連串考試展開，得中秀才之後，還有三年一次的鄉試與會試。他將進入一種永恆的競爭，只要沒有考中舉人，就會被無法消除的緊張感所包圍。

梁啟超是個幸運的孩子，他在縣試中脫穎而出。這一年的主考官是縣令彭君穀，任新會縣令十多年，頗享有勤政愛民的聲譽。接着，梁啟超就要前往廣州參加府試，新會與廣州的輪船尚未開通，應試者往往結伴購買一艘小船，沿西江而上，一起度過這三日的行程。梁啟超是船上最年幼的一位，其他人都已是父輩——屢試不中是大多數讀書人的命運——他們在船上做文字遊戲，即興的詩詞、對聯幫他們逃避枯燥的典籍，展示個人才華。一日午飯時，一位同船者指着盤中的鹹魚，希望梁啟超以此為題作詩一句，梁啟超即刻對以「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滿座動容，神童之名由此傳開。^②

梁啟超的好運氣沒在廣州再現，他沒能在府試中嶄露頭角。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很有可能是在這次廣州之行中買到了《輶軒語》與《書目答問》。西湖街上的書肆，為這個少年展現了一個新世界。現代印刷尚未普及，雕版印刷的書籍仍是奢侈品，品類稀少，有權勢與財富的人才能創建自己的藏書樓，並且只為族內開放，很少成為公共圖書館。儘管梁家已經算得上鄉村中的書香門第，但除去四書五經及應試的書籍，也只有《史記》《綱鑒易知錄》而已，當梁啟超從父

①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5頁。

②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頁。

輩手裡獲得《漢書》《古文辭類纂》時，已經大喜過望。他偏愛《史記》，司馬遷高度的文學性與對歷史之熱忱早早就紮根於梁啟超的心裡，多年後他正是以這兩種特質聞名。

《輶軒語》與《書目答問》則把他引向一個更豐沛的學問世界。這兩本書是聲譽日隆的官員張之洞的作品，1870 年代出版後隨即風靡讀書界。前者設定的對象是渴望進學的童生、害怕歲考的秀才，告訴他們如何應對考試，如何維持一個讀書人的道德水準。後者更複雜，是對清代學術的某種總結，從傑出學者到不同的學科分類，再到目錄學、版本學這些考證功夫，都給出了簡明的介紹與指引。張之洞二十六歲高中探花的經歷、四川學政的身份，使這種勸誠尤具說服力。兩本書的風行也從反面折射出時代風氣：讀書人日益狹窄、品質也不斷墮落。不管怎樣，這兩本書給梁啟超打開了一個新世界，讓他感受到純粹學術之樂趣，「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感慨此前「昔不知學」。^① 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日後會與這位大人物關係密切。

梁啟超在 1884 年的院試中勝出，成為一名生員，俗稱秀才。考慮到當時中秀才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十二歲的梁啟超已經顯得過分早熟與幸運。新秀才要簪花披紅、齊聚學道衙門，分班排列，賜酒一杯。茶坑村充滿了歡聲笑語、鞭炮聲，梁啟超從此進入特權階層，可以穿著綠青的藍綢長袍、戴無花的銀頂帽子，還能免繳人頭稅、免服雜役，見到官員不用下跪，成為宗族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從此走上了一條功名之路，有機會考中舉人甚至進士，成為天子門生。

更令人喜悅的一幕接踵而來。廣東學政葉大焯巡視全省、來到新會時，照例要對所有秀才進行考試，並從中選拔秀異之士。梁啟超脫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 12 頁。

穎而出，應答頗令學政滿意。面見結束，眾人退下時，梁啟超突然跪下，請學政為即將七十大壽的祖父寫一幅壽序文，以求「永大父之日月，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為宗族交遊光寵也」。這真是一個理想神童的作為，他不僅關注功名，更關注孝道。葉意外之餘深表讚賞，毫不遲疑地把梁啟超放入劉敞、柳偃、陸從典、顧野王的行列，這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神童，也是在十二歲時顯現出驚人的才華，要麼能解《莊子》，要麼能讀《尚書》，要麼能作《柳賦》……他還讚許茶葉坑的梁家「祖孫父子兄弟，相聚一堂，怡怡濟濟」，就連漢代的石氏、唐代的柳氏、宋代的呂氏也不過如此。^①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 12—13 頁。

廣州一定是 19 世紀最擁擠也最激動人心的世界都市之一，很多觀察者——商人、外交官、記者、傳教士——在此駐守多年或匆匆一瞥，留下了類似的記載。

「你一旦來到廣州的大街上，」一位美國記者在 1871 年的《紐約時報》上寫道，「就幾乎分辨不清東南西北。」密密麻麻的街巷上，是更為密密麻麻的店鋪，「這些店鋪老闆的名字和他經營的業務都油漆在一塊長長的厚木板上，木板垂直地懸掛在店鋪的門口，如果有一陣大風吹來，它們就會左右搖擺，彼此碰撞，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音。」

在一家家禽鋪前（很可能是燒味鋪），他看到「一隻一隻又肥又大的雞鴨，它們整隻整隻地被壓成板狀，做成了乾貨，油脂肥厚，露出深黃的顏色」；他還發現，這裡遍地是茶館，「常常是三十人圍坐在一些小桌子旁，面前擺放着茶水、餅乾和糖果之類的東西。他們之間的談話歡快但不喧囂」；他也發現當地人喜歡吃狗肉與貓肉，因為製作的工藝複雜，味美異常，所以「如果你不去想這點，很可能會情不自禁地坐下來，美美地享受它一大盤」；大煙館也是城市裡普遍的景象，他看到「十到十二個各種年齡的男人在噴雲吐霧……他們所有人都似乎在盡力於從他們所置身的客觀存在中消失，忘卻這人世上他們所無法忍受的煩惱和憂傷」。

登上一座典當行的頂樓時，他看到了整座城市的面貌：「寬闊的珠江、清式和西式的閣樓、寶塔、博物館、清真寺、大廈、倉庫、商鋪等等，這些建築物……毫不間斷地緊緊挨在一起。遠處可見英國領事館的小教堂，上面有鐘樓和高高的十字架。高高的粵秀山和白雲山聳入雲端」，而藉助望遠鏡，他看到城外的鄉村，「像世外桃源一樣，

如歌如詩」。^①

十三歲那年，梁啟超來到這座城市。這裡有眾多書院和琳琅滿目的書籍，還有給予他指點的名師，助他科舉之路更進一步。這是他第一次離家居住，由父親陪同，表兄譚鑣也一起到來。比起孤島上的茶坑村和小小的新會城，廣州是個規模宏大、光怪陸離的新世界，他們進入的是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

《紐約時報》的觀察，是這座城市漫長的傳統、層疊記憶的一個切片。自唐代以來，廣州就以刺激、財富與世界主義聞名，與東南亞、中東、非洲的貿易不僅帶來巨額財富，也帶來了陌生的文明。懷聖寺光塔上隨風改變方向的金雞，訴說遠道而來的阿拉伯商人的故事；六祖慧能在光孝寺剃度，給後世留下了「風動幡動還是心動」的著名論辯。這城市屢遭摧殘，黃巢曾在9世紀將它一把火燒毀，17世紀的耿精忠、尚可喜也曾殘忍地屠城。自19世紀中葉以來，危機開始接連不斷地到來，廣州先是在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戰爭中成為前線，接着在1854年的紅巾軍起義中被圍，當時的總督葉名琛大開殺戒，幾乎血洗了廣州的街道；再後來是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城，時間長達三年之久。但這裡總有令人讚歎的消化能力，能輕易從混亂、屠殺、陌生的衝擊中恢復過來，再重新一頭紮入鬧哄哄、元氣充沛的日常生活。

廣州也見證了中華帝國由盛至衰、由封閉至開放的過程。它是18世紀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那些渴望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的外來商人生活在珠江旁一個狹窄的地段，與指定的中國行商進行交易。他們不能與當地人交往，不能進城，不能學習中文，甚至連攜帶女眷都被視作異常行為，派往中國的使節更是被傲慢地拒絕。這一模式被稱作

① 鄭曠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第38—40、43頁。

「廣州體系」(Canton System)，象徵了中華帝國沉溺於自我中心，對外部世界不屑一顧。

但這些外來者最終證明自己與之前的阿拉伯、印度商人大為不同。他們用武力攻陷了這座城市，甚至有一段時間還託管了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改造。在小島沙面上，他們不斷建立起新巴洛克、古典風格的建築，修造花壇、公園、俱樂部、雕塑、球場、草坪，讓它變成了一座小型的歐洲城市。他們帶來的科技、商業、品味也逐漸滲入日常生活。一些餐廳提供煎牛排，來自美國的麵粉「色白粉細」，洋酒（特別是香檳）、色拉油、餅乾很受歡迎，曼徹斯特的進口洋布也讓當地人感歎「洋紗幼細而勻，所織成之布自比土布更為可愛，而其染色更嬌豔奪目，非土布所能望其肩背」。^①當地的大戶人家在住宅中採用鐵鑄的廊柱，扶手椅、梳化、彈簧床、皮大椅、洗面台，這些傢具日漸普遍。一層商店、二層住宅的騎樓在市區內出現，它的廊道令人想起本雅明日後所描繪的拱廊式巴黎。外國人曾經連城都不能進，中文都不允許學習，現在已經可以在這裡創辦學校，開設現代醫院，編輯報紙，雖然仍要承受大量的敵意與偏見，卻慢慢站穩了腳跟。中國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應着這種衝擊。輪船招商局在廣州開闢新航線，廣州可以通往上海、汕頭、香港、澳門、煙台、牛莊，這些通商口岸構成了一個中國港口的網絡。廣州還架設了與香港、上海的陸路電報線。造紙廠、鍋爐廠，接着是製革廠、玻璃廠、縫紉機廠、罐頭廠逐一出現。

古老的習俗也與這些新事物如影隨形。這是一個炫耀與寄生的社會，沒有一個商人與官員不被大批僕從所包圍，迷戀用玉石做成的如意、煙盒、扣子、戒指、手鐲，每個人的右手拇指上都戴着「扳指」。

① 梁鼎芬、丁仁長等編《番禺縣續志》卷 12，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 188 頁。